

# 中國聖經學家——房志榮神父

趙英珠<sup>1</sup>

本文嘗試以郎尼根（Bernard Lonergan, 1904-1984）的神學研究方法論，說明房志榮神父的學術發展過程與架構，並列舉部分房神父的著作，探其整合的成果。

## 一、神學背景

在輔仁聖博敏神學院（簡作「輔神」）的迴廊，時常看到耶穌會士房志榮神父穿梭其間；即使如今已不復見當年他健步如飛地，來往於輔神與輔大耶穌會法管會院的校園之間。

房神父1926年出生於安徽省貴池縣；父親是一位「代書」，專為村裡的人寫信、寫狀紙……等。房神父一歲時，父親就過世了，家中尚有一兄二姐，由於母親負擔太重，兄姐就被送到親戚家中撫養；房神父是老么，便由母親一手扶養長大。

過年時，母親帶著房神父到「北門」外祖母家過年。「北門」（貴池縣城北門吉兒巷）有個教堂，建築美麗、莊嚴，房神父常與孩子們在教堂玩耍。外祖母家後門，可以遠眺天主教堂，特別是堂頂的十字架和避雷針，安置在屋頂的前後兩端。十歲左右，某下午和幾個小朋友走進聖堂，看見祭台上的花燭，聽到信友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趙英珠女士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碩士畢，現任本院神學著作編譯會研究助理。

的歌聲和神父的詠唱，覺得很有趣。不久，就跟母親一同到教堂學教理。教堂內正好有「聖體降福」，莊嚴的佈置與其歌聲深深吸引了房神父小小的心靈。回「南門」後，他便向母親要求聽道理。於是，房神父在男校與神父聽，母親在女校與修女聽，兩人一起學習天主的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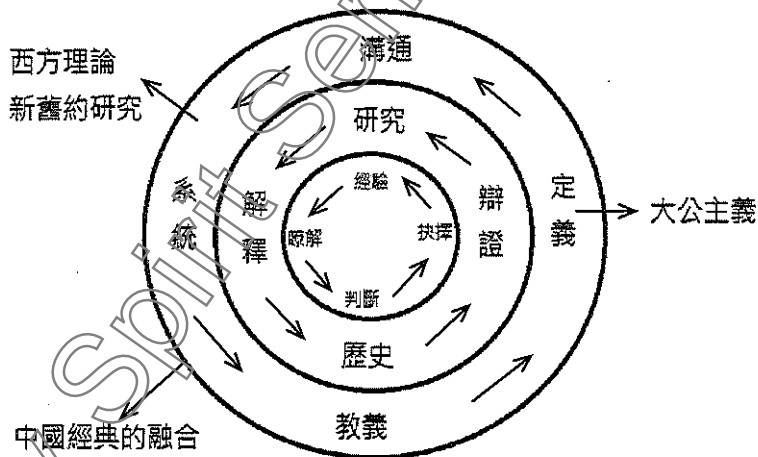
領洗後，房神父就進了當時的備修院（小修院）當修生；他在修道院度過了小學、中學，繼而轉到安徽省蕪湖教區的宣城大修院就讀。在小修院的學習期間，院長是位西班牙籍耶穌會神父，除了自己教一些西方的思想、語言（如拉丁文、英文等）外，還請一位秀才來教中文，當時也念了四書五經。

1945年在宣城大修院的期間，是兩年哲學與更進一步學習外文的時候。1946年教廷建立中國聖統，將中國大陸分為20個教區，安慶總主教梅耿光（Federico Melendro, SJ）被祝聖為主教；為了培育中國聖職，梅主教招募一些修生去羅馬傳信大學讀書，房神父的外語能力非常優秀，1949年理所當然地去了羅馬。

羅馬的課程結束後，房神父仍懷念小時候耶穌會的教導方式，一直渴望進耶穌會。1951年便在西班牙進了耶穌會。晉鐸後，會長神父詢問他的意見，未來要往什麼方向發展，房神父希望往靈修、聖經或教育方面繼續學習。當會長神父看了他的資料，發現他讀了拉丁文、希臘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義大利文、西班牙文，應往聖經方面發展較好。於是，他回羅馬聖經學院攻讀碩士；之後去了聖地做四個月的聖經考古，再到德國慕尼黑讀完聖經學的博士學位。

獲得聖經博士學位後，房神父被派往馬尼拉的碧瑤神學院，教了九年神學。1967年神學院搬回台灣，附屬於輔仁大學，房神父也隨即來到台灣繼續任教。1968年教會本位化政策，開始用中文教授神學，房神父也擔任神學院院長。1969年開始編《神學論集》，1972年開始編纂輔大神學叢書，逐步奠定中國神學本位化的基礎。在輔神執教時期，他曾任輔大宗教研究所所長，亦建立在台灣體制下的宗教教育研究。1988年擔任《益世評論》雙週刊社長，致力於關懷教會與社會問題的批判性研究，更進一步研究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之間的大公合一問題。

## 二、房志榮神父的「神學思想」架構



房神父的學習與成長過程，是在一個系統體制下，溫和漸進地建構、發展與改革的。這段歷程，包含了他的經驗、瞭解、判斷、抉擇，當然也影響了他的個性、工作態度與研究成果等。

本文以下便從郎尼根知名的神學研究方法論<sup>2</sup>，探其思想架構。

1. **研究**：羅馬傳信大學的研讀、耶穌會的修道生涯、聖經學碩士的研究、聖地的考古及博士的研究，已可看出房神父的研究過程與精神。
2. **解釋**：聖經學研究在二十世紀蓬勃發展、方法各異（如：聖經批判學、聖經倫理學、聖經詮釋學、聖經歷史、聖經靈感、聖經導論、聖經科學、聖經靈修、聖經神學等），房神父在此方面下了不少功夫。為找到聖經原有的面貌、判定其文本是否出於某個人或某個團體，以口傳、書寫或某種文學類型記錄下來，不同的批判方法及詮釋分析是必要的。
3. **歷史**：聖經研究與歷史脈絡是分不開的。雖聖經中的記載主要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傳統，但它提供的文獻與歷史背景，至今仍影響我們瞭解、闡述、分析、判斷基督信仰的內涵。
4. **辯證**：聖經學家採取類比、辯證等詮釋方法，不僅得出聖經形成的不同因素，也能忠實呈現不同時代的信仰生活與真實面貌。這項研究成果，帶來了重要的里程碑。
5. **定義**：經由上述分析及闡釋，可進一步發現聖經中的信仰、禮儀及法律等啓示性意義。房神父認為，聖經中的每種文學形式，都記錄了以色列民族的信仰生活，以天主對整體人類的救恩方式表達出來；為此，聖經中的文字都包

---

<sup>2</sup> 主要參考 Bernard Lonergan, *Method in Theology* (New York: Seabury Press, 1972) 一書。

含了豐富的社會局勢、信仰價值觀、禮儀行動、法律制度及生活背景等，也處處可見個人、團體歸向天主的過程。

6. **教義**：經過上述的史料解釋與分析過程，一方面說明了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根源，二方面也啓示了天主子耶穌基督的傳承；而後者，便是一切傳統的真正目的及用意。這些都是爲確定基督教義——什麼是來自天主的直接啓示、什麼是當信的道理、什麼又是後人在聖神內所作的信仰反省。
7. **系統**：聖經學家對基督教義有著基礎性的貢獻。他們使信仰有了系統性的依據，也爲後繼的神學家奠定了基礎。
8. **溝通**：聖經學家對內協助建構神學思想，對外協助推廣福音；其貢獻不僅搭起個人與天主溝通的橋樑，也是教會對外福傳所不可或缺的。

### 三、從房志榮神父的部分著作，分析不同時期的思想

#### (一) 奠定期：西方理論思想背景

房神父在羅馬傳信大學研讀時期，接受嚴格的西方教育——文學、哲學、神學，最後專研於「聖經」學科：

1. 在語言方面：必須具備古典語文，包括希臘文、拉丁文、希伯來文、阿拉美文、科普特文……等；及現代語文，如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義大利文……等。
2. 在歷史學方面：房神父曾赴聖地考古，並熟知聖經中的每個人物、地點與歷史背景。考古學知識與古老文獻資料的研究，對聖經研究的重要性可見一斑。

3. 善用工具書：因工具書集結了所有前人的研究，浩瀚無窮，善加發揮，更能左右逢源。
4. 不斷地研讀現代聖經研究者的新發現：聖經研究的新發現，在廿世紀如雨後春筍般冒出；如龔格（Hermann Gunkel, 1862~1932）的類型批判、源流批判……等，必須隨時保持更新、研讀與批判。

房神父作為一名聖經學家，《舊約導讀》上、下兩冊便是其代表作。筆者採訪時，房神父表示，進入聖經研究這個浩瀚領域，需要一輩子持續的努力。以龔格為例，他所提出的類型批判、源流批判，先是受到德國民俗民謠採集家的影響，後又見到美所不達米亞及埃及古宗教的考古文物出土，這些資料與舊約聖經有許多相似之處，進而逐步發揮，影響了新舊約的歷史、文物、語言等研究。此外，編輯方面也很重要，編輯將不同的文學類型編纂在一起，有的編輯還會加上自己的想法，後世的解經學家、釋經學家的研究，就是將不同源流還原，分辨出哪些是某個團體的原著，甚至哪句話是編輯自己加上去的。因此聖經研究，需要具備各方面深厚的學術基礎。

## （二）嘗試期：中西合璧

1967年神學院搬回台灣，附屬在輔仁大學之下，房神父隨即來到台灣繼續任教；1968年教會本位化政策，開始用中文教授神學，房神父亦擔任神學院院長；1969年開始編《神學論集》；1972年開始編輔大神學叢書。房神父隨著梵諦岡第二屆

大公會議的開放政策，逐步奠定了中國神學本位化的基礎。

此時，房神父第一篇有關聖經本位化的研究：〈試以周易乾卦卦辭馬太福音的「法天」〉<sup>3</sup>問世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房神父比較、分析了：瑪五 45~48 中，耶穌要我們效法聖父的完美，以及《易經》乾卦中的「法天」<sup>4</sup>。文章中，房神父比較了兩段經文的源流、歷史背景，進而分析《易經》的經文，強調《易經》的天並非沒有位格的自然界現象，而是有「好生之德」的「天地有心而生萬物的神」。

爾後，在〈儒家思想的天與聖經中的上帝的比較〉<sup>5</sup>一文中，房神父更引用了中國歷代典籍文獻（如《尚書》、《易經》、《論語》……等），來研究儒家思想的天有無位格、分析天人關係，並與聖經做比較。而〈聖經及中國經典中的「更圓滿的意義」〉<sup>6</sup>一文，則是房神父對周易乾卦「法天」思想的延伸。

### （三）整合期：理論與實踐

由上可見，房神父在輔神教書期間，研究領域已不限於聖經部分；他不但逐步發展出其他領域的學問，而且成就斐然。雖然他本人強調：「我從未刻意計畫去做什麼，但依據聖神的領

---

<sup>3</sup> 收錄《神學論集》29 期（1976 秋），329~347 頁。

<sup>4</sup> 即「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」

<sup>5</sup> 收錄《神學論集》31 期（1977 春），15~41 頁。

<sup>6</sup> 收錄《神學論集》51 期（1982 春），1~27 頁。

導，亦或他人的需要，我接受邀請而撰稿，從未想到拒絕，如此一來，倒也走出不同的路來了」。具體而言，房神父在這段整合理論與實踐的時期，有下列三方面的努力和成果：

### 1. 大公主義合一運動

房神父不僅在輔神開設「大公主義」的課程，也實際參與合一運動的相關活動。房神父表示，梵二以來，天主教會渴望謀求與分裂的基督信徒合一；依此，他將理論具體地實踐出來：

- (1) 參與普世教協的會議：基督新教的普世教協(WCC)自 1948 年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第一屆大會，此後每 6~7 年在不同地方召開。而 1961 年在印度新德里的會議，可謂 WCC 的高峰；房神父便是此次台灣天主教會出席參與的代表。
- (2) 代表天主教會參與各項活動：梵二以來，天主教會以言、以行，切實做到合一的誠意。包括持續地與基督新教來往、與 WCC 合作、與某些教派在教義上進行溝通；也與東方教會建立長久的官方交談與溝通；甚至與其他教派展開神學交談。具體而言，自 1967 年起，便陸續開始與英國安立甘教會、路德宗聯盟、衛理會、改革宗聯盟等，進行神學交談；此外，也有針對神恩復興運動及普世聖經聯盟的合作。房神父不但都參與其中，也有具體的貢獻，如：與世界聖經公會發表共同翻譯的聖經。
- (3) 推動台灣的大公運動：輔神歷年來，不但招收基督新教的學生，且很多畢業生已經封牧，或擔任重要的牧職工作；房神父在此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，是具體的見證。



## 2. 《書生論政》

雖然房神父強調，書生論政這時期其實是一個巧合，但卻也是一個恩寵。故事緣起於 1988 年，由於《益世評論》週刊缺少一個社長，羅光主教本想請「黃神父——黃俊傑神父」幫忙，但羅主教的發音不標準，就變成「房神父」了。即便如此，房神父接下這份工作，不但做得有聲有色，甚至出版了五本《書生論政》的叢書。

當時，房神父默思這份工作的神學意義——這也是理論與實踐整合的時刻。基於司祭應有先知性的使命，對時代訊號、政治缺失，應有先知性的洞察與關心，並勇敢表達出來。於是房神父收集政治方面的資料，以一介書生的胸懷，表達對國家、對世界的品評。

## 3. 《三字經》與基督宗教

1999 年 10 月，天主教《喜訊》月刊邀請房神父撰寫一系列文章，內容主要是聖經與中國文化的比較與對話。於是，房神父開啓了聖經與中華文化結合的另一旅程。在經典的選擇上，房神父選擇了《三字經》作為起步。

《三字經》是我國家喻戶曉的一本小書，三字一句，共 472 句、1416 字，把中國自古以來的天文、地理、歷史、教育、倫理、道德、為人處世等，都交代了一番，可謂民間智慧的一部小百科。房神父企圖用聖經來解釋《三字經》，兩者相互輝映；所不同的是：《三字經》只用幾句話，點到為止，聖經卻用長篇的故事、神學、啓示，加以充分的說明。

天主教在聖經中的啓示，一方面補足了人的追尋，另一方面也照亮了中國歷代的民間智慧。從房神父的「三字經與聖經」的比較，便可一目了然，以下試舉三例說明：

- (1) 論起源與創造：《三字經》的首句「人之初」，可對應於創一1：「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」，或是若一1：「在起初已有聖言」。比較這三者的語言：《創世紀》用希伯來文、《若望福音》用希臘文、《三字經》用中文寫成；這三種古老文字都說「初」，但所指對象不同：一個指向天地，一個指向聖言，一個指向人。此外，聖經雖不言五行，但木、金、土、水、火都曾出現於新舊約中，極富實質的意義。
- (2) 論人倫關係：中國傳統文化極重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的五倫關係，彼此也都有重情重義的溝通模式。《三字經》把父子放在最前、君臣放在最後，頗有創意；聖經似乎沒有兄友弟恭積極一面的故事，但消極一面的反證倒是不少——如：人類第一對弟兄，加音和亞伯爾，就上演了兄殺弟的慘劇（參：創四8~10）。
- (3) 將中國歷代的皇帝與聖經中的帝王相比較：「夏有禹，商有湯，周文武，稱三王；夏傳子，家天下，四百載，遷夏社」；同樣的，舊約聖經裡也有三王——撒烏耳、達味和撒羅滿，其生活言行分別記錄在《撒慕爾紀》（撒烏耳和達味）及《列王紀》（撒羅滿）裡。這些相關的比較，常是扣人心弦、發人深省、有趣的故事。

## 結 語

在訪談房神父、研讀其著作、分析其神學思想後，深覺感動。從房神父的幼年故事，便可看出天主對他的旨意和帶領。他一歲時便失去父親，接著面對兄、姐的分離，他獨自一人跟隨母親；想當然耳，房神父的母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但他也不諱言：「那時母親沒有太大的能力培育我，只有交託天主」。

所幸，房神父幼年即進了小修院，為他打下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基；多年後，神父學成來到台灣，此根便開始萌芽、結果。從房神父研究聖經與中國文化的對比交談中，其思想有如滴水穿石，又好似天主就活在中國文化的氛圍裡，令人如沐春風。

今年適逢房神父九十歲大壽，感動之餘，謹以此文恭祝神父：生日快樂！

## 後 記

房神父的著作極多。文章方面，請讀者參閱《神學論集》150 及 190 期「作者索引」中「房志榮」的各期論文。至於書籍方面，值得一列的有：《舊約導讀》（光啓，1995）、《創世紀研究》（光啓，1972）、《新約諸書分類簡介》（光啓，1972）、《聖經與聖經學》（光啓，1968）、《在福音發源地體味福音》（上智，1993）、《絕妙禱辭：聖詠》（光啓，1976，與于士錚合著）、《梅瑟五書批判小史》（聞道，1968）、《舊約諸書的形成》（聞道，1997）、《三字經與聖經》（輔仁大學，2002）、《邁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大陸天主教》（光啓，2001）、《書生論政》1~5 冊（益世評論雜誌社，1992）。